

数字化转型下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机遇与挑战

邹梦露

(1.青岛黄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摘要: 在新文科建设与教育数字化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高校外语教学正由“技能本位”向“素养导向”转型, 课程思政与外语教学改革的深度融合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本文立足数字化转型语境, 围绕混合式教学、虚拟仿真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态, 分析数字化手段如何通过教学载体多元化、呈现方式多模态化与互动模式对话化, 促进思政元素的情境化嵌入与学习过程的证据化呈现, 从而提升外语课程的育人效能。同时, 本文指出技术滥用可能引发思政教育碎片化与价值弱化, 师资数字素养与思政素养协同不足制约融合质量提升, 评价指标缺失与过程证据薄弱导致融合效果难以量化与持续改进。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技术赋能—内涵引领”同构为原则, 强化“外语+思政+数字化”复合型师资建设, 并重构兼顾过程性与终结性、定量与定性的多元评价体系, 形成“教—学—评”闭环, 推动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同频共振、提质增效。研究旨在为构建“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价值观念”三位一体的高校外语教学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外语教学改革; 课程思政; 混合式教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92

Integ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Zou Menglu

Qingdao Huanghai University, Qingdao 266555,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ngoing 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s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from a “skills-based” orientation to a “competency-based” (literacy-oriented) approac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CIP) with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moral education). Gr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echnological modalities such as blended learning, virtual simulation, an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nalyzes how digital approaches—through diversified instructional media, multimodal presentation, and dialogic interaction—facilitate the contextualized embedding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e evidence-based documentation of learning processes, thereby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Meanwhile, the paper highlights that misuse of technology may lead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 weakening of value guidance; insufficient synergy between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literacy constrains the improvement of integration quality; and deficiencies in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weak process evidence make integration outcomes difficult to quantify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s a principle of align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with “substantive value guidance,”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osite faculty team with competencies in “foreign languages + CIP +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re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that balances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as well a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hereby forming a closed loop of “teaching–learning–assessment”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and CIP.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a three-in-on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ystem integrating language competence, cultural literacy, and value orientation.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curriculum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blended learn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新文科建设与教育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的双重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学正在经历由目标、内容与方法共同驱动的结构重塑：课程定位从以语言知识与技能训练为中心的“技能本位”，逐步转向强调综合素养、批判性思维、跨文化理解与公共表达能力的“素养导向”。这一转向意味着外语课程不再仅承担“学语言、用语言”的工具性功能，而需要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之外回应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由此，课程思政作为高校育人体系的核心路径，与外语教学改革的融合不再是外在叠加的政策要求，而是外语课程实现育人价值与学科转型的内在必然：外语学习过程天然关联价值判断、文化立场与话语选择，跨文化交际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更要求学习者具备基于中国立场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从而使“语言能力提升”与“价值观念塑造”具备同向同构的融合基础。外语教学不仅承担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使命，更肩负塑造青年学生正确价值观、培育文化自信与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责任。孙有中等人指出，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紧扣时代趋势，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协同，这一观点为二者融合提供了重要遵循[1]。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这一融合提供了新的实现条件。以混合式教学平台、移动终端、虚拟仿真、学习分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工具，凭借交互性、多元化与智能化特征，正在打破传统课堂在时间、空间与资源供给上的限制：混合式教学延展了语言学习的场域，使教学从单一课堂走向“课堂—平台—社群”的连续空间；多模态资源提升了文化议题与价值主题的可感知性，使思政元素能够通过案例、叙事与场景任务更自然地嵌入语言实践；智能化工具则以即时反馈与个性化支持降低学生参与复杂议题讨论的语言门槛，为思政元素的隐性渗透与精准传递搭建了全新平台。然而也应清醒看到，数字化并

不天然等同于育人质量提升，技术扩张甚至可能放大既有问题并生成新的治理难题：平台化教学可能引发信息过载与学习过程碎片化，生成式AI可能带来学习真实性与主体性削弱；若思政融入停留在材料替换与环节叠加，易出现“表面可见、内在无效”的价值弱化；同时，外语教师需同时具备语言教学能力、思政素养与数字化能力，而现有培训与评价机制往往难以形成闭环，影响融合推进的深度与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数字化转型语境下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机遇所在、现实难题，并提出针对性思考，为构建“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价值观念”三位一体的外语教学体系提供参考。

一、数字化转型为二者融合注入的全新机遇

数字化技术的迭代升级，正从教学载体、呈现形式与互动模式等多个维度，为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开辟新赛道，并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传统教学中“融入场景单一、学习证据不足、育人效能难以放大”等痛点。与以往依赖教材文本与课堂讲授的线性路径不同，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平台化资源供给、多模态内容呈现与智能化学习支持，使课程思政能够更自然地嵌入语言学习过程，实现“价值引领不脱离语言训练、语言训练内含价值生成”的协同目标。总体来看，这一机遇主要体现在思政融入场景的拓展、课堂互动结构的重塑以及资源整合效率的提升三个方面。

（一）教学载体多元化：拓宽思政融入场景，提升情境化与可感知性

传统外语教学中，思政元素多依托课本文本、教师讲解与课堂提问进行传递，受限于材料形态与教学时空，容易出现“生硬植入”“点到为止”的问题：思政内容被作为补充段落或价值总结出现，难以进入语言学习的核心活动链条，学生也难以

在真实语境中形成判断与表达。数字化工具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限。首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能够整合微课、纪录片、外媒报道、政策解读、国际案例等多元资源,为语言输入提供更真实的语境支撑。例如,在跨文化交际主题教学中,引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案例视频或国际媒体报道,不仅丰富了语篇类型与语用情境,也使学生在理解与比较中更直观地把握中国实践的全球意义,从而实现语言学习与价值理解的同步推进。其次,虚拟仿真技术可以构建沉浸式跨文化交际场景,如模拟国际会议、文化交流、公共沟通等真实情境,让学生在角色扮演、协商对话与危机应对等任务中进行语言决策与价值选择,引导其在互动中坚守文化立场、践行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再次,AI语言工具(智能翻译助手、写作反馈系统、口语测评与对话练习等)能够基于课程主题提供个性化练习与即时反馈,使学生在反复修订与迭代输出中提高表达质量,同时在任务指向的价值议题中训练立场表达与证据组织能力。李丹等人的研究显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AI工具对显性思政元素的识别准确率可达82.7%,为思政载体的精准适配与资源匹配提供了技术支撑[2]。从“载体”层面看,数字化使课程思政更容易走向情境化、任务化与可视化,为隐性融入提供了更坚实的实现条件。

(二) 互动模式革新: 激活学生主体性,增强思政育人的对话性与生成性

课程思政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能否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真实参与与主动建构,而非停留在被动接受。数字化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弹幕互动、在线讨论、即时投票、小组协作与项目式学习等形式,重塑课堂互动结构,为价值引领从“讲授型”走向“对话型”“生成型”提供了可能。在外语课堂中,教师可借助平台发起“中国故事外语讲”主题讨论,引导学生用目标语言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故事、时代楷模事迹,并在同伴提问、补充与质询中完善叙事结构与论证逻辑,使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通过语言实践逐步深化。更进一步,线上协作工具能够支持跨班级、跨院校的联合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全球治理”等主题开展资料检索、立场形成、证据整合与成果呈现,在协作探究中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感悟”的转变。与传统课堂相比,数字化互动的价值在于可持续与可留痕:学生讨论、协作、修订与展示的过程能

够形成可追溯的学习证据,为后续评价与改进提供依据,也使思政育人从一次性说理走向持续性生成,提升感染力与说服力。

(三) 资源整合高效化: 缓解思政资源筛选压力,推动资源供给体系化与共享化

在传统外语教学中,思政资源的筛选与适配往往依赖教师个体经验与时间投入,存在资源分散、针对性不足、更新不及时等问题,导致不少教师在实践中“想融入但无从下手”,或只能采用零散材料临时补充,难以形成稳定的教学主线。数字化转型为资源供给体系化提供了基础条件。高校可以建设外语课程思政数字化资源库,将经过筛选的文本、音频、视频、课件与案例按语种、课程类型、能力目标与思政主题分类归档,形成“可检索、可复用、可更新”的资源体系,从而显著降低教师备课成本,提高资源适配效率。宁琦指出,数字人文赋能外语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在于构建系统化、可共享的数字化资源体系,这一思路为资源库建设提供了关键指引[3]。同时,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与共享机制使优质资源更易在校际、区域甚至跨语种范围内流动,教师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教学案例,将全球视野与家国情怀融入语篇解读与任务设计,帮助学生在比较与辨析中形成更为稳健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资源整合的高效化不仅解决“资源从哪里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融合如何稳定推进”提供制度性支撑。

二、二者融合面临的数字化转型挑战

尽管数字化为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融合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形态、更灵活的教学组织方式以及更便捷的学习支持手段,但在具体落地过程中,技术应用、价值引领与制度保障之间并未天然形成协同,实践层面的矛盾反而更容易被放大。尤其在“平台化教学”“数据化管理”“智能化工具”快速进入课堂的情境下,一些课程出现了“技术工具强势介入、育人逻辑弱化”的现象:教学看似更加现代化、活动更加多样化,但价值目标与语言目标缺乏同构设计,思政元素难以在学习过程中递进生成,最终容易陷入“重技术、轻内涵”“重形式、轻实效”的误区。总体来看,当前挑战主要集中在技术滥用引发的育人碎片化、师资能力结构性不足以及评价体系滞后三个方面。

(一) 技术滥用导致思政教育碎片化与价值弱化

数字化转型最容易出现的偏差,是将“技术使

用”等同于“教学改革”，将“资源堆叠”等同于“思政融入”。在一些课堂实践中，教师把课程思政简化为多媒体素材的拼贴：播放思政视频、插入若干案例图片或热点材料之后，缺乏必要的语篇解读、价值澄清与任务化转化，导致思政内容停留在“观看/接收”的浅层环节，难以进入语言学习的核心活动（理解—表达—论证—反思）。更进一步，生成式 AI 的普及也带来了新的风险：部分教师借助 AI 快速生成教案、课堂提纲或讨论问题，但由于缺乏对“思政目标—语言目标—任务链”的结构化设计，往往出现逻辑衔接松散、价值议题与语言训练脱节的问题，课堂最终呈现为“材料很多、主线不清；观点很多、论证不足”。与此同时，数字化平台的信息海量性与碎片化呈现方式容易造成学生“信息过载”：学生接触到大量主题相关材料，却缺乏足够的引导去提炼核心概念、辨析价值冲突与形成稳定立场，从而使价值引领停留在碎片化刺激与表层情绪认同，难以沉淀为可迁移的判断能力与表达能力。

此外，智能教学工具的算法设计往往更偏向语言技能测评与学习行为统计（如词汇掌握、听说训练频次、作业完成率等），对价值判断、文化理解、论证质量等思政维度缺少可评价的指标接口，进一步加剧“技能训练”与“价值塑造”的结构性失衡。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生成式 AI 在语料来源、价值取向与文化立场上可能存在偏差。李丹等人的研究指出，生成式 AI 存在明显算法偏见，西方文化渗透率达 71.3%，对思政价值引领可能产生干扰[2]。在缺乏有效筛选、引导与课堂规则的情况下，技术不仅无法赋能，反而可能成为价值弱化与立场漂移的风险源。

（二）师资能力不足制约融合质量的提升

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融合对教师能力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教学能力，还需要具备将思政目标转译为“可教学、可任务化、可评价”的课程设计能力，并能熟练运用数字化平台与智能工具实现混合式组织与证据化评价。换言之，融合推进的关键不在于“教师是否愿意做”，而在于“教师是否具备做成的能力组合”。现实中，部分外语教师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思政意识与理论理解不足，对课程思政内涵把握不深，容易将其理解为内容叠加或主题点缀，导致挖掘思政元素时停留在文本层面，难以形成与语言学习高度耦合的任务链与讨论路径；另一方面，数字化技能欠缺，对混合式平台、学习数

据、AI 工具的应用停留在操作层面的“会用”，缺乏教学法层面的“善用”，难以把技术转化为促进学习与价值生成的脚手架，甚至因技术不熟练导致课堂节奏被工具牵引，出现“为用技术而用技术”的反向依赖。刘晶等人的研究指出，在 AI 赋能背景下，外语教师需要重构数字身份，成长为兼具语言教学、价值引导与数字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当前多数教师尚未达到这一要求[4]。与此同时，高校层面面向“外语+思政+数字化”的系统化培训供给不足，常见培训要么偏技术操作、要么偏政策宣讲，缺少围绕“目标同构—任务设计—证据评价—课堂治理”的整合型能力路径，导致教师难以获得可迁移的课程设计方法与可复制的优秀案例，从而成为融合推进的核心瓶颈之一。

（三）评价体系不完善导致融合效果难以量化与持续改进

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评价体系不仅是检验学习效果的工具，更是牵引教学改革方向的制度杠杆。如果评价仍然主要指向语言知识与技能，那么课程思政就容易被边缘化为“展示性环节”或“材料性装饰”；如果缺乏对过程证据的采集与解释机制，融合实践就难以形成可持续优化的闭环。当前评价模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评价内容上，仍以词汇语法、听说读写技能等为核心，对文化素养、价值判断、跨文化伦理、公共表达责任等思政维度缺乏可操作的指标体系与评分标准，导致教师“想评但无从评”，学生“重分数而轻素养”；其二，在评价方式上，过程性评价占比不足，虽然平台记录了大量学习数据，但这些数据往往呈现碎片化、行为化特点（点击、时长、次数），难以直接对应“价值生成”与“论证能力提升”，最终仍高度依赖终结性考试与一次性作业，无法客观反映学生在讨论、协作、反思与作品迭代中的素养发展。评价体系的滞后不仅削弱融合质量保障，也会降低教师投入融合改革的动力，使课程思政更易回落到“可展示、不可检验”的形式化路径。

三、破解融合困境的路径探索

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多重挑战，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融合不能停留在“增加平台工具”“丰富素材形态”的表层改良，而应回到外语教学的基本规律与思政育人的核心要求，建立能够长期稳定运行的课程结构与质量保障机制。总体而言，破解融合困境需要在三个维度同时发力：一

是以“目标—任务—证据—评价”一体化为核心，实现技术赋能与育人内涵的同构；二是以教师能力结构升级为抓手，形成可持续的专业发展路径；三是以评价体系重构为制度杠杆，推动融合从“可展示”走向“可检验、可改进”，最终实现外语课程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提质增效。

（一）坚持技术赋能与内涵引领并重，筑牢融合根基

数字化工具的价值不在于“使用本身”，而在于其是否能够服务于立德树人的目标实现与外语能力的有效建构。因此，技术应用必须从“工具驱动”转向“目标驱动”，以课程目标为牵引完成资源选择、活动设计与评价机制的系统匹配。首先，在教学设计层面，应将课程思政从“内容叠加”转向“能力嵌入”，把价值目标转译为可教学的能力指标，并通过语言任务链实现自然融入。例如，在跨文化交际主题中，不仅安排文化知识输入，更应设计包含立场表达、证据支持与受众意识的输出任务，通过对话、辩论、协商等互动形式，使学生在语言实践中完成价值澄清与判断训练。其次，在资源使用层面，高校应引导教师围绕教学目标筛选与加工数字资源，避免“素材堆砌”与“信息过载”。数字资源的引入应遵循“可讨论、可论证、可产出”的原则：材料必须能够支持学生完成观点形成、证据组织与表达呈现，而非仅作为课堂装饰。再次，在技术治理层面，应推动智能教学工具的迭代优化，使其逐步具备对思政相关能力的支持接口与评价维度。例如，在口语或写作智能反馈中引入论证结构、证据使用、受众适配、跨文化语用得体的指标，让语言技能与价值能力在评价逻辑上形成一致性。此外，应加强平台内容管控与资源审核机制，建立可靠的外语课程思政数字资源库，形成“可共享、可更新、可追溯”的资源供给体系，避免低质信息与偏差内容对价值引导产生干扰，从而为融合提供安全、稳定、高效的教学环境。

（二）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协同育人能力

融合质量的上限最终取决于教师能否完成“外语教学—思政育人—数字技术”三者的结构性整合，因此师资建设应从“单项培训”升级为“能力结构重塑”。建议构建“专项培训+教研共同体+实践赋能”的三位一体培养体系，形成从理念到方法、从方法到课堂的连续提升路径。首先，专项培训要从政策宣讲或工具教学转向“课程设计能力训

练”，重点提升教师在三方面的关键能力：一是思政元素的学科化挖掘能力（如何在语篇、话语、跨文化情境中提炼可讨论的价值议题）；二是任务链与课堂治理能力（如何把价值议题转化为可执行的语言任务并组织对话与论证）；三是数字化与AI工具的教学法能力（如何把工具作为脚手架而非替代者，并建立可审计的学习证据机制）。其次，建立教研共同体与案例共建机制，通过集体备课、同课异构、课堂观摩与评课等方式，沉淀可复制的融合范式与任务模板，降低教师个体探索成本，提升整体实施一致性。再次，以项目化实践赋能推动能力内化：鼓励教师参与混合式课程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或AI辅助教学改革项目，在真实课堂中迭代方案、积累数据与证据，形成从经验到模型的提升路径。最后，应建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与工作量认定制度，将融合课程建设、资源库贡献、教学研究与质量提升纳入考核与奖励体系，避免教师将融合工作视为“额外负担”，从制度层面保障融合推进的可持续性。

（三）重构多元评价体系，保障融合实效

评价体系既是质量保障工具，也是改革方向的制度杠杆。若评价仍主要指向语言知识与技能，课程思政将难以进入课程运行的核心环节；若缺少对过程证据的采集与解释机制，融合实践也难以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因此，应建立“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定量评价+定性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形成覆盖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与价值观念的多维指标框架。其一，在评价内容上，需要将思政相关能力具体化、可操作化，避免停留在抽象态度判断。可将评价指标聚焦于学生在语言实践中的可观察表现，例如：观点表达的清晰性与立场合理性、证据引用与论证结构的完整性、跨文化语用策略的得体性、信息核验与偏见识别能力、公共表达责任与受众适配意识等，并将课堂思辨表现、线上主题发言、作品集与实践成果（如“中国故事外语创作”“跨文化交流项目报告”）纳入评价范围。其二，在评价方式上，应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的数据追踪优势，但必须将“行为数据”转化为“学习证据”，避免仅以点击率、观看时长等替代真实学习质量判断。可通过草稿迭代记录、讨论纪要、同伴互评、反思日志、口头答辩与情境任务表现等方式构建证据链，并结合教师评价、同伴评价与自我评价形成多主体评价体系，提高评价的公平性与可解释性。谢幼如等

人提出,数字化转型赋能课程思政评价创新,需要依托技术实现评价维度的多元化与评价过程的精准化,这一观点为评价体系重构提供了重要依据[5]。其三,在制度层面,应将融合教学质量纳入教师考核与课程质量监测体系,以评价反向牵引教学设计优化,形成“目标设定—任务实施—证据生成—评价反馈—持续改进”的教-学-评闭环,避免融合实践停留在可展示但不可检验的层面。

结语

数字化转型为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从机遇层面看,平台化资源供给、多模态呈现方式与智能化学习支持显著拓展了思政融入的场景与路径,使外语课堂能够由“文本讲授”走向“情境化实践”,由“单向灌输”走向“对话式生成”;从挑战层面看,技术滥用导致的育人碎片化、师资能力结构性不足以及评价体系滞后等问题,亦可能使融合滑向形式主义,出现“技术热、内涵弱”“看得见、评不出”的偏差。由此可见,二者的深度融合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外语教学突破传统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其成效取决于能否在数字化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育人结构与质量保障机制,而非单纯依赖工具引入或资源扩充。

面向未来,高校外语教学应在数字化浪潮中坚守育人初心,摒弃“技术至上”的误区,将技术应用纳入课程目标与育人逻辑的整体框架之中:以技术赋能为支撑,推动思政元素由“内容叠加”转向“能力嵌入”,通过任务链与情境化活动实现价值生成;以师资建设为核心,构建“外语教学能力—思政素养—数字化能力”协同发展的教师专

业成长机制,提升课程设计、课堂治理与证据化评价的综合能力;以评价重构为保障,建立覆盖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与价值观念的多元评价体系,强化过程证据采集与可审计性,形成“教—学—评”闭环,促使融合从“可展示”走向“可检验、可改进”。崔国鑫指出,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立足时代特征,实现理念与方法的双重创新,这一论断为二者融合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6]。唯有在理念、方法与制度层面同步推进,才能培养出兼具扎实语言能力、深厚文化素养与坚定价值信念的新时代外语人才,使外语教学在数字化转型中真正焕发育人活力,并为国家对外开放与文化自信建设提供更具支撑力的人才与话语基础。

参考文献

- [1] 孙有中,张莲,陈法春.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原则与路径[J].外语界,2024(2):2-3.
- [2] 李丹,肖勇.人工智能赋能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智能挖掘与融合路径创新研究[J].前沿教育研究,2024(3):45-53.
- [3] 宁琦.数字人文赋能外语学科的思考与探索[J].外语界,2023(1):12-17.
- [4] 刘晶,李佐腾.AI赋能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身份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25(6):78-84.
- [5] 谢幼如,邱艺,章锐,等.数字化转型赋能高校课程思政的实施进路与评价创新[J].中国电化教育,2023(8):92-98.
- [6] 崔国鑫.高校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思考与探索[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10):37-42.